



謝南光著作選

謝南光
郭平坦

著 (下)
校訂

《謝南光著作選》（下）

《謝南光著作選》

著者 謝南光

校訂 郭平坦

發行人 黃溪南

出版者 海峽學術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 五九六三號

通訊處 (一〇六) 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二二三號六樓

電話 (〇二) 二三二一八五五二

傳真 (〇二) 二三二一八六一一

印刷所 興海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 一九九九年二月

定價 上下冊六〇〇元

劃撥帳號 一四六八九二二六 方守仁帳戶

I S B N 957-99227-8-0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台灣人的要求

從民衆黨發展過程談起

自序

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一月七日，我將以前的論文集成《台灣人如是觀》一書刊行，受到意外的歡迎，我作為作者卻頗感汗顏。原計畫再出一本《台灣社會運動十年史》，但至今未能如願。這並非我的懈怠，也不是改變了初衷，只是因為關於殖民地內容的文字檢查日趨嚴厲，在這種情況下，恐怕一半內容都要刪去才能出版。那樣意義不明的東西即使出版了也沒有價值，所以只得暫時延緩計畫，代之以出版本書。本書通過探索近十年來台灣社會運動的軌跡，尤其是民衆黨的發展過程，以展示台灣人以往在政治、經濟、社會上的要求，故而命名《台灣人的要求》。絕不能說我們過去沒有錯誤，差別僅在於是將其隱藏還是公開加以反省。我決心展示出我們過去的真實面貌，也許看到這些紳士們會感到不快，而年輕的鬥士們則會批評這種展示和反省不徹底。但是雙方的責難本身就表明了我們的現狀，所以我甘受雙方的責難，並希望雙方共同克服這些問題。

另一種非難大概是「不夠深入」、「論述不充分」之類。確實，我也是這麼認

爲。但書中內容多處被刪，這一說明可算是對該非難的回答吧。

如果說我對拙作有什麼企盼的話，第一希望戰線外的人士認識我們的真實面貌。第二希望後加入戰線的人了解我們運動的足跡，若能幫助他們免走彎路，正確前進，則欣幸之至。投身社會運動必須勇於踏著先行者的血跡前行，絕不能爲過去所束縛。同時當不能徹底反省自己而無力引導民衆時，應激流勇退，以免因之誤導民衆。也許我自己就應該成爲第一個實行者。只要民衆的願望如此，不僅我，任何一個解放鬥士都會甘之如飴，因爲阻礙民衆的進步乃是最大的罪惡。

回首過去我們的足跡，展望前途，我有時感到黯然。人——社會也同樣——總是在重複錯誤。差別僅在是否知道錯誤，知道就能克服它；反之，則在謬誤中衰亡。發展中總會有反省，我們並不後悔犯過錯誤，但可怕的是不知道錯了，這就是我徹底揭示一切的原因。如果拙作使某些人士感到憤怒，那麼希望這些先生們能體諒我的這番心情。就此謹獻上我的第二拙作，望賢者指正。

著者謹誌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第一章 十年來的社會運動

一、序言

「台灣民衆黨往何處去？」是自治聯盟成立以來，島內最受矚目的問題之一。要回答這個問題，我認爲應首先明確民衆黨在台灣社會運動中的地位。民衆黨是如何產生的？留意台灣社會運動的人都知道，它是文化協會分裂的結果。而文化協會又因何分裂？不知道其中真相的人絕不在少。因此，在回答「台灣民衆黨往何處去？」之前，有必要大略概括一下十年來的台灣社會運動史。通過十年運動史的回顧，民衆黨的地位就明瞭起來了。故爾，本書開卷第一篇就記述十年來的社會運動。

本章涉及的內容，主要是說明社會運動各組織系統，略述各個團體的產生、發展情況。對各團體的事業的詳細介紹不多化篇幅，對其主張的評論也留待日後。今

天台灣還有不少記者不知道民衆黨和文化協會的區別，將二者混同，發表只有自己懂得的自以爲是的議論來指導社會的御用記者還有很多。這些人不和實際社會運動家接觸而批評社會運動，過去的時代可以這樣做，但今後的社會不會允許這樣。曲解真相或者不瞭解事實而想當然地批評，不能給實際運動任何貢獻和影響。從這個角度看，提供一些事實絕非無益。可以確信，在這個意義上回顧十年運動史不是沒有價值的。

台灣從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年）歸屬日本以來，發生了大小幾十次鬥爭，始於台灣民主國的武力反抗時代，結束於大正四年（一九一五年）的西來庵事件，這二十年概言之是武力反抗時代。細緻考察這一階段的發展過程可以分爲幾個時期，但這個工作還是留待將來吧。

以文化的現代的方式進行抗爭，始於大正三年（一九一四年）的同化會運動。其前曾有用非武力手段反對總督府強迫XX政策的歷史，那時沒有任何組織，沒有制定持久的目標。反對林本源製糖公司強行收買土地的鬥爭就是一例。因此，從介紹十年運動史角度出發的話，把同化會的組織作爲開端，是比較合適的。

二、同化會的歷史意義

在嚴峻政治形勢下，台灣同化會在大正三年（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成

立於鐵道旅館中，大正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解散。它的目標是同化台灣人，以求將來得到和日本人同樣的待遇。該會因何解散，又因何在大正九年反被田總督以同化主義的名義為台灣政府所一手推銷，其原因頗值得玩味。簡單說，當時政府在思想上、政策上強調差別，同等待遇的要求事實上意味著××政策的漏洞，對日本本土人來說，是想都想不到的台灣人的僭越。然而從大正八年朝鮮獨立運動開始，受世界大戰影響，世界各殖民地的統治發生極大動搖。作為這種動搖的穩定劑被田總督撿起來的，實際上曾被棄之不顧的同化主義的糖果。而台灣人對此已不屑一顧。同化會創立時，為林獻堂和坂垣伯作翻譯、斡旋其間的蔡培火當時被免去教職，此時反而得到晉京留學的機會，成為他和林獻堂結為密切關係的機緣。這是後來創立啓發會的一個基礎，是值得注意的史實。

另一方面，地方的名門及當時擔任公職的區長們也加入了同化會。如總督府評議員黃純青切指寫血書入會，現州協議會員甘得中也是同化會最熱心的成員。這一派的人後來成立同風會。同風會終於成為完全的反動團體和公益會的手足，是天下共知的事實。也就是由於政府的壓制，同化會的成員中右翼成為同風會，左翼成為啓發會。值得注意的是，現在的右派林獻堂、蔡培火當時是極左派。這並非他們退步，而是他們被急劇的社會進步的浪潮淘汰了。這一事實對稱他們為溫和派的人來說是很好的反駁。根據下面列出的「近代社會運動系統圖」，試著探索台灣十年來的運動歷程。關於同化會應談的東西頗多，考察其內幕發現，有當時台灣官場的

勢力鬥爭，有中央政界的黨派鬥爭，因此不僅嚴重扭曲了坂垣伯的工作，不僅瞭解了林熊徵授爵運動的真相，殖民地資本家埋葬坂垣伯的計謀也能顯露出來。遺憾的是，其中的詳情這裡只能割愛了。（圖示見下頁）

三、從啟發會到新民會

同化會因官方的鎮壓瓦解後，表面的運動消亡了，而暗流仍在繼續；同時，普通的知識階層很受啟發，開始真正研究「台灣人該怎麼辦？何時能解放？」這些問題。其時的六三法廢除運動採取了過渡時代的運動形式，終於產生了孕育啟發會的基礎。六三法廢除運動製造了大正七年和東京留學生結合的機會，導致了啟發會的組織。啟發會組織的內情及經過、解散的原因將發表於拙作《台灣社會運動十年史》，在此僅略述作為過渡階梯的啟發會。由啟發會的成立，「台灣人採取怎樣的政治形式能解放？能擺脫現在的桎梏？」就不可迴避了。啟發會十分無可奈何地消亡了，但新民會得到了它的活動成果。大正八年啟發會解散到大正九年新民會成立，是反省思想對立和感情對立的時代。而這個反省迅速結束的外因有三個：一是蔡惠如的奔走；二是朝鮮獨立運動；三是和平協會與林呈祿的接觸，其間詳情如前述將在他書論及。簡單經過是：啟發會解散後，東京的留學生因前述理由痛感建立團體的必要性，加上蔡惠如的奔走，大正九年一月十一日在東京市外澀谷蔡氏的宅

[illegible]

邱舉行了新民會的成立會議。十年史的第一頁從這裡翻開了。

蔡惠如被選爲新民會第一位會長，蔡氏堅辭不就並推舉林獻堂。但難以拒絕會員的強烈要求，終於同意在林獻堂就任前出任臨時會長。在創立大會上，根據林仲澍、彭華英的提議，一致同意創辦雜誌，這就是今天《台灣民報》的前身《台灣青年》的雛形。但對一向清寒的青年學生來說，雜誌的發刊實在是個難題，雖然決議通過了，然而實行碰到了困難。當時蔡惠如有自己的房子，而他由於連年事業失敗，祖先的遺產幾乎已用盡，處境窘迫。但三月六日他離開東京去北京時，把一千五百圓交給送行的林呈祿，囑咐他先出一、二期雜誌。由此可見，十年史的第一頁蔡氏起到很大的作用。

其後，由於新民會幹部的活動，先後籌集到辜顯榮的一千圓、林熊徵的三千圓、林獻堂的一千圓、顏雲年的一千圓等大批捐贈，七月十六日發刊的《台灣青年》卻違背下村長官的杞憂——連三期都出不了，而是茁壯成長起來。

當時《台灣青年》的主編者如下：

蔡培火 彭華英 林呈祿 林仲澍 吳三連

王敏川 徐慶祥 蔡玉麟 蔡式穀 石煥長

羅萬俤

《台灣青年》的發刊產生了極大轟動，受到島民熱烈的歡迎。同時，給了居住南洋等地的海外台僑很大的影響。雜誌陸續從各方面得到捐贈，獲得了意外的收

穫。愈獲島民的歡迎，官方的壓迫則每出一期愈加重一層，這是自然的。

四、台灣議會

朝鮮的「萬歲事件」（著名的獨立運動事件）給日本強烈的衝擊。憲政會總裁加藤高明在憲政會東北大會的演說中提到「朝鮮將來應給予自治」，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日本朝野如何重視「萬歲事件」。當時，原內閣化了八億經費用日本製的機關槍沒有鎮壓成革命俄羅斯的赤色思想，而俄羅斯共產主義革命的成功，成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絕大的憧憬。僅大正九年一年，有德國的變亂、土耳其安哥拉政府的成立、法國發生革命總同盟罷工、義大利工人佔領工廠、捷克斯洛伐克發生革命總同盟罷工、愛爾蘭興起獨立運動，因此沒有沉浸於統治階級的花言巧語的餘暇了。後來，朝鮮國民協會的首要人物閔元植被殺，也完全是這場革命旋風的影響。

此時，以內地延長主義為思想背景的「六三法撤廢運動」，開始並未得到留學生的贊同。這種思想對立從大正七年持續到大正九年末，留學生之間、留學生和台灣島內派之間因思想對立，氣氛很不融洽。而田總督已暗定要保存六三法，並於大正九年在議會上提出。依據大正十年三月十五日發佈的第三號法律，六三法被保存下來。

另一方面，大日本和平協會的會長阪谷男爵和該會幹事川上氏擔心：如果台灣也和朝鮮一樣要求獨立，問題就嚴重了。難說是幸與不幸——因為和平協會的事務所在林呈祿住所附近，注意台灣人問題的川上氏很快和林呈祿氏親近起來，就台灣問題屢屢交換意見。和平協會的人提出，只要承認日本的主權，無論什麼樣的內部大改革方案和平協會都會鼎力相助。一次在和平協會主辦的台灣、朝鮮精英的招待會上，針對前述意見，在座的朝鮮人說：「不承認我們朝鮮人的獨立，就無以承認日本人的誠意。只承認這個原則，才有商量的餘地，否則我們的參與沒有意義。」言罷離席而去。和台灣議會運動在台灣被認為非國民相反，在東京之所以得到有實力的本土人的支持，正是因為有上述的環境。《台灣青年》創刊以來，常常登有阪谷男爵的文章，也是因為前述的原因。

新民會的幹部們呼吸在上述空氣中，終於得出「只有台灣議會才能解救台灣人的痛苦」這一結論。即使這個時候，明治大學的某派別仍在宣揚「六三法廢除論」，反對「台灣議會論」。但聽了林呈祿氏的說明後，明治大學的反對派很快放棄了原來的主張。大正九年冬，在富士見町教會召開的大會上，意見趨於一致。留戀「六三法廢除運動」的人們在大正十年三月十五日的第三號法律出台後，也已經沒有留戀的餘地，台灣人的解放運動只剩下台灣議會這一條途徑。

台灣議會運動以六三法的存在為前提，在這個前提下，和田總督的想法是一致的。不過是要求得到授予總督的律令權、預算的審議權、協贊權而已。這個要求遠

不如澳洲、加拿大，僅要求在殖民統治下實施民主主義而已，所以得到了本土的實力人物的贊成。因為這是合乎和平協會所謂「如果承認日本的主權，無論什麼大改革運動都給予支持」的心情的。而在台灣的本土人（編者案：疑為「內地人」）卻熱中於宣傳這是「獨立運動」、「反日本運動」、「否認日本主權的非國民運動」，極力煽動本土人的敵對情勢；而在消息靈通人士看來，這是很可笑的。不應該忘記的是，這種費力而無效的宣傳反而起到了喚起台灣人意識的作用。對台灣人來說，「台灣議會」成了重大問題。

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議會請願書在大正十年十月二日向帝國議會提了出來，林獻堂在署名人中排名第一，使台灣官方十分驚愕。很快在御用報紙上進行了不堪入耳的詆罵，給了台灣人非常大的影響。從此，林獻堂放棄了一貫的做法，完全和留學生聯合起來，並逐漸成為他們的領袖。

台灣官方為什麼吃驚呢？因為總督府一直是以懷柔土著資產階級作為其對土著人民政策的基礎；而土著資產階級卻改變態度，和新興知識階級聯合了起來。當時的無產階級還沒有進入運動圈子。無產階級的崛起使台灣議會運動發生了重大變化。其詳情和台灣議會的思想根據的解剖及其命運，將另作闡述。

五、文化協會

《台灣青年》雜誌對台北中學以上的學生衝擊非常之大，明顯地促進了學生們的自覺性，他們開始熱情地研究課程以外的思想問題。像台北師範學校，每期都有幾十本避開了學監的嚴密監視分發在各室輪流閱讀，一年內一次未被學監發現。運動的契機是謝大達的家鄉訪問飛行。以此為機會，各學校放棄了過去的矛盾，聯合組織了歡迎會，以此為開展學生運動的起點。這個運動在醫學專科綱校由李應章、吳海水、何禮棟主持。師範學校方面由謝春木、盧丙丁、蔡撲生等主持，蔣渭水在醫學生幕後進行聯絡和指導。當時的人們最費心思的，是引出什麼樣的結果。

以上的事件發生在大正九年（一九二〇年）秋天。大正十年四月，活躍於東京台灣青年會的林仲澍歸台任職於電力公司，同時和蔣渭水等接觸，由此產生了組織團體的契機。畢業於醫科學校的李應章、林麗明、吳海水、林瑞西等立足台北，準備仿東京台灣青年會發起青年會，給蔣渭水看了青年會規章。蔣渭水提出：既然要幹，最好組織範圍更廣泛的團體，終於發起文化協會。大正十年，為請願台灣議會赴日歸台的林獻堂開完歡迎會之後，該發起計畫被急劇推動。

組織文化協會的動機，大抵上核心人物之一蔣渭水在《台灣民報》六十七期大正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的五周年紀念號上說的那樣：